

*Shehui Bianqian
Zhong De Guizu*

社会变迁中的贵族

— 16—18 世纪英国贵族研究

姜德福 著



商務印書館

社会变迁中的贵族

——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

姜 德 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姜德福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ISBN 7-100-04102-3

I. 社… II. 姜… III. 贵族—研究—英国—16世纪~18世纪 IV. D756.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5692号

**本书得到大连大学人文学院
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ÈHUÌ BIÀNQIĀN ZHŌNG DE GUÌZÚ

社会变迁中的贵族

——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

姜德福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102-3/K·801

2004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½

定价: 19.00元

序

社会变革与英国贵族阶层的命运

16世纪以降,欧亚大陆的各个传统社会,均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变革趋向,尽管各自发生的变革的程度并不一样。以往,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运动变革,进行了相当深入艰苦的探索与认识,其成就可谓斐然。但是,也应看到,这些探索认识尚未构成一种立体、全面、系统的认识。人们的历史认识视野虽然已经触及到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结构变革的认识与分析;但其认知方式是以经济—政治为基本维度和主体框架。近些年来,人文社会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和相互触动逐渐加强。并且,通过自身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一些学科不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对于历史学科的影响与触动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从而使史学研究状况和发展态势发生相当明显的改观。

社会史研究是国内外史学研究中一个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成果非常丰硕的学术领域。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领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深入发展对于历史学本身学术研究的深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近年来,中国世界史专业,无论是古代、古典、中古,还是现代史,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均取得了一些相

当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就对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的作用,笔者以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通行的那些偏重于各种以总结归纳历史规律为旨归,但又疏于细致缜密的宏大的叙事模式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纠正;二是它通过自身的发展与成就,向史学界的传统观念和结论提出了众多的诘难和质疑,使许多长久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定论和看法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三是它把社会学所独具的理论、方法和观察视角,引入到史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觉更加丰富、多样,使人们对以往社会发展、运行、变革的历史的认识更加精确、细致。

姜德福同志的《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学术发展变革背景下完成的一部新作。十余年前,德福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史学硕士学位,曾得到著名史学家朱寰先生以及孙义学和于庆和二位教授的教诲。在高校执鞭任教数年后,他又从我攻读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前后,我本人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16—18世纪亚欧诸国社会结构变迁比较研究。当时,我考虑将自己所带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纳入到课题研究的团队之中。故在德福入学之初,经共同商议,将西欧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由中世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确定为德福在学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们二人虽有师徒之名,但实际在这个课题研究上,我们更多的是相互切磋,共同探讨。随着对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是英文文献梳理、研读的逐步进行,对国内外学术现状的分析与把握的渐渐深入,英国贵族在社会整体结构变迁中的地位与命运逐渐地引起他的关注。德福认为无论是在学术价值,还是在学术发展空间上,关

于英国贵族的研究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系统进行探讨的问题。如今,这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集中研究16—18世纪英国贵族变革的学术专著,便是他数年来精心钻研的结晶。

前些时日,他来信相告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他的著述,并嘱我为其专著作序。这实在令我深感欣喜同时又有些惶恐。欣喜的是,德福在这一课题研究上所付出的心血在这么快的时间内,便刊行出版,化为学术成果。而令我惶恐的原因有二:一则自己从未为人著述作序;二则我本人也是一个学习者,无论资历,还是学识,似乎都未达到给他人著述作序的程度。原本想推却,但德福几番来电相催,只好应承。好在自己也一直对英国贵族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地位和命运在进行思考,尚有些心得。因而,这篇权且称之为“序”的文字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我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二是对德福这部专著的一些评估。

自迈出蒙昧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趋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构成状况始终处在不断的裂变当中。原始社会社会成员之间那种平等相处,和睦共存,共同支配社会财富、社会权力资源的状态,逐步向不平等的方向演化。在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斗争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人类比较高级的存在状态——文明社会,却在种种不平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况中展开自己的演进历程。而等级(estate)的形成、划分与差别,构成了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社会——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特征。因此,在进入现代文明发展阶段之前的传统社会,

与其说是一个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还不如说是一个等级社会(estate society)。

等级制度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外在体现。这种制度既具有反映政治权势、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标识功用,又是一种蕴含着社会价值及评判标准等历史内容的时代象征。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的范畴,等级制度与当时社会的其他范畴保持着十分错综复杂的联系。如等级与阶级两个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甚至在内涵上也有某种重合之处,但它们却是相互有别的两个历史范畴。从渊源上讲,前者基本是由特定的社会法律、政治体制、文化传统而生,后者基本是据社会经济关系而定;从内容上说,前者主要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和人们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后者则主要反映人们在与生产资料上的不同层次和人们在财富分配结构中的不同关系;从相互关系而论,等级制度往往是阶级制度外在的社会的历史显现形式,阶级制度则是等级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从社会功用的动态分析上看,等级制度常常起着维护现存阶级状况的作用,而阶级关系的变动程度则决定了等级关系变化运动的方向、速度和幅度。作为传统社会体制的核心和外在表现,等级制度意味着社会秩序和礼制规范,因而必须具有相当稳定的特性,否则断无可能承担起支撑整个社会的重任。

贵族,无论是在政治上,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上,作为生产资料和财富的拥有者,还是在社会生活上,作为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集团,在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由以农耕为本的传统文明向以工商为本的现代文明的过渡

变迁阶段,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变迁,各种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动荡。此种情形在16—18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运动中显得十分突出。对传统框架的“解构”过程与现代框架的“结构”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促动。各种社会关系在新的格局下重新组合,而且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重组运动也以自身独具的功能影响着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和总体特征。从总体而言,此时的英国社会结构运动同其他国度社会变迁一样,也以从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变迁为基本内容,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变迁“首发性”、“原发性”的影响,英国社会结构的运动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并给英国近代社会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16世纪以降,英国社会经济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较之中世纪鼎盛时代,此时英国社会财富结构尤其是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出现相当剧烈的变革,由此导致自诺曼征服以来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人群的社会位置发生移位、变动,其相互关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尤其是乡绅、约曼和城市富裕市民集团的迅速崛起,构成一个极具实力的社会阶层。社会上各种违背、僭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行为和言论也纷纷出现。变革旧有社会框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与历史的趋势。“英国历史的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发生变化和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的时期,而且是一个类别发生变化的时期。”^①

16世纪之后,英国社会经济的财富结构变动不可谓不深刻,“在1500年和1700年间土地转移方面的大规模活动的最终结局,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303页。

好像是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跨越社会界线的网状运动。”^①阶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不可谓不剧烈，特别是1640年内战的爆发，更向人们展示出君王被杀、贵族遭逐的惨烈局面。然而，这一切并不曾改变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整体框架，社会结构的变革运动依旧在国王、贵族、绅士、平民等级结构的外表下进行，等级秩序依然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仍是英国社会的常态。笔者以为这种新的变革运动采取传统的方式进行正是此一时期英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在变革时代，英国的等级制度、观念和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式仍具有着关乎社稷安危、国家存亡的重要机制和功用。因而英国“宫廷不可能对破坏等级身份持乐观态度，它自己居于这种制度体系的顶端。实际上它也没有抱这种态度。它爱护这种制度，加强这种制度，精心维护这种制度，为这种制度支付费用”。^②而当时那些因有效经营农牧、从事工商而发达起来的社会成功人士，虽对旧有的社会等级关系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希求变革，但他们的不满和愤慨仅仅是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自己拥有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这一现实。他们的希求也只表现为应使自己尽快尽早地跻身于上层社会等级之中，以证实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已。而对等级秩序本身，他们并无恶意，更无推翻摧毁的意图，相反，在1540—1640年间，英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在有产者中间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对爵秩、纹章的追求浪潮。而促成这种浪潮发生的一个必然前提就是等级秩序的存在和人们对其的尊崇。费希尔说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71页。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22—323页。

伊丽莎白女王的重臣伯利勋爵——一个用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都不失为卓越的人——尽力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威尔士小诸侯的后代。而这个威尔士小诸侯可能从来就不存在。^①莎士比亚，一位恰巧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文坛巨匠，曾以极为生动的诗句表述出他对等级秩序的观念：“天空中的诸星辰，以及我们这个星体，恪守着各自的位置和尊卑等级。可是一旦众星超出常轨，运行便无目的，将要发生多少灾祸与不祥的变异！发生多少反叛之举，多少山呼海啸，地陷山移！”^②他还明确而简洁地讲：“没有等级，就没有国王”。一位在内战时期为捍卫王权浴血拼杀的大贵族纽卡斯尔侯爵也认为，“没有贵族，便没有国王”。而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位曾将国君送上断头台的革命枭雄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这方面也表现得“与普通人差不多”，他所竭力维持的也是“英国数百年所闻名的等级与秩序：贵族、士绅和自耕农”。^③浓厚的等级观念，对爵秩品级的追求以及围绕于此所发生的各种社会运动都表明，英国等级秩序在表面上对社会结构变迁遮蔽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变化成为社会结构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结构的变更主要是以等级间的流动变更为主要内容。这或许是此时英国社会运动的又一特征。

英国社会结构运动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在保持完整的等级结构和森严的等级秩序的同时，英国各个等级均呈开放、流动的特性。无论是当时英国各个等级频繁更迭其成员，还是某些心怀不满、感叹世风日下的人的抱怨都直接地或间接地表明，英国当时的

①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67页。

② 转引自[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1年版，第124—125页。

③ 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第174页。

等级具有某种开放性。而正是这种开放性为流动性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这种开放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英国的等级结构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力。

贵族阶层是英国等级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仅次于国王而高居社会万民之上的等级品秩。凭借优越的社会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特殊的军事功能，英国贵族阶层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可谓是叱咤风云，盛极一时。无论是对内统治还是对外征战，贵族都是绝对重要的封建政治力量，尽管该阶层曾与国王不时地发生冲突、对抗，但就本质而言，贵族阶层是英国封建王权最为坚实而强大的社会基础。依其所占有的广袤地产、田庄和众多劳动人手，贵族阶层亦是英国封建剥削阶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16—18世纪期间的英国社会变革大潮中，英国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大起大落，变动不定。贵族的地位、命运究竟是“沉”还是“浮”？面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冲击，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略是什么？这些措施和方略对于社会的变革过程与结局又具有何种作用与意义？便成为英国史探讨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对这一时期英国贵族阶层的研究，又是深入、系统研究英国社会变革运动过程及特征的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

其实，综观英国史学术研究的衍生发展历程，贵族始终是不同阶段的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贵族研究也始终是英国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关注与研究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对贵族群体本身的研究所得出的成果，主要是对贵族的构成、家族、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沿革、发展与变化状况的探讨；二是对贵族与社会整体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成果，主要是从英国的社会

政治统治嬗变演进、社会经济变革发展、社会结构改组变迁等多种角度和不同层面来分析判定贵族的历史命运,并看取贵族的时代作用与意义。

早在17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内战成因的反思中,就有人对贵族的命运与王国的动荡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正是斯图亚特王朝对贵族制度的损害方导致了内战灾难的发生。^①而此后无论是在18世纪的托利学派、辉格学派还是19世纪的新辉格学派中,贵族阶级始终处于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尽管史观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前后,英国史学界出现重大变革,即以往以托利、辉格两大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观逐渐被各种新的史观和新的学派所取代。其中风头最劲的是以R. H. 托尼、L. 斯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派和以C. 希尔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埋首进行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以经济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当时的英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努力寻求16世纪之后英国社会变革的状况和特征。20世纪中叶,托尼、斯通与欧美其他学者围绕着“贵族的衰落”、“乡绅的兴起”等话题所爆发的论战,把对贵族的研究带入一个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又更为广阔的历史场景之中。仅就学术史而言,这次论战也是英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事件。对于后来英国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这次论战有着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它所形成的“衰落”与“兴起”的对应分析框架及话语模式,长期为人们所沿用,在中国史学界这种情

^①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论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封爵政策及其后果》,《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第15—23页。

形尤甚。20世纪晚期英国形成的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对托利、辉格、社会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各种基本观念和方法进行了反思、检讨,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笔者以为当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与关注。^①

在教学与课题研究中,依据英国史学同行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我本人对英国贵族命运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对“贵族衰落”的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得出了以下基本认识:

贵族的经济实力:经济是社会生活中变化最快也最为复杂的领域。在社会变革时期,英国贵族的经济实力的状况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但又难以形成定论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叶,劳伦斯·斯通曾发表《对伊丽莎白时代贵族的剖析》一文,提出了16世纪英国贵族衰落学说。1965年,他又发表《贵族的危机 1558—1641年》一书,形成关于英国贵族衰落的理论。斯通在其著述中通过对当时英国贵族所占有的地产数量的减少、物质生活的奢靡、婚丧嫁娶的挥霍等各种经济表现的勾勒、分析,得出其经济实力大为消退的结论。他的这种观点虽然一时流行,但就在其刚刚形成的同时,即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其中最强烈者莫过于特鲁弗—罗珀教授。有关贵族是否衰落构成了20世纪中叶英国史学界“乡绅的崛起”大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侧面。应当说,斯通的著述对于推动贵族研究,特别是对贵族经济实力的研究十分有益。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表明,贵族在英国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表现得都相当的活跃。“与托尼最初所想的

^① 有关英国内战史的研究,从一个特定侧面反映出对贵族史研究的状况。请参见拙文《关于17世纪英国内战成因研究的学术回顾》,《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90—97页。

同,都铎王朝统治的一个世纪可能并没有引起贵族土地所有权的锐减。”^①当时的经济运动的主要趋势如地租上涨、物价上涨等都对以食租、食利为生的英国贵族阶层有利或至少是利大于弊。在农业上,他们与农场主相互协调,共谋渔利;以往那种农场主是通过损伤贵族地主利益而发财致富的说法难以成立。在工业中,许多贵族嗅觉敏锐、视野开阔、敢于投资。利用煤、铁开采特许权,通过修建运河特别是城市房地产交易大发其财。^②在16世纪,施鲁斯伯里伯爵六世甚至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工业家之一。在商业上,贵族阶层显得格外活跃,有人曾言:“从伊丽莎白时代起,最乐于投资远洋贸易的正是上层贵族。”^③就连对贵族持严苛态度的斯通也承认“在这一时期,贵族充当了一个其他任何一个阶层,包括乡绅和商人,所无法也不愿与之竞争的角色。——这一阶段贵族的重要性更是由于他们愿意鼓励和资助新的冒险事业。这些冒险事业被认为风险很大,因而不能确保更谨慎的社会集团的支持。由于大型矿业和冶金工业在都铎时期还是新鲜的事物,他们在这些行业的扩展中起了带头作用。由于大洋贸易和探险也是新鲜事物,他们再次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④或许贵族在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有所减弱,但就16—18世纪中叶这一长时段而言,英国贵族在经济实力上并未出现整体滑跌的局面。如果将这一时期,尚有乡绅、富商、高官中的陆续补充进这一阶层考虑在内,贵族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24页。

② 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第207页。

③ [法]布罗代尔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541页。

④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04页。

阶层仍是英国社会中的最富有者。从土地依然是财富的主要内容上看更是如此,1700年贵族拥有英国土地财富的15%到20%,1780年为20%到25%。^①

贵族的政治权势:16世纪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势依旧很大。尤其是爱德华六世时代(1548—1553年),贵族势力再度膨胀。1558年伊丽莎白登基时,“英国各大地区都处在几位大公爵和伯爵的控制之下”。同时“贵族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亲兵武装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以往认定的期限长得多。……诸如萨福克公爵和莱斯特伯爵之类的大贵族仍有能力招募私兵”。迟至1599年,彭布罗克伯爵还向女王表示,一旦情况危急他就能够向陛下“提供至少300名骑兵和500名步兵的武装,并且由他私人承担军饷、粮秣”。^②此外,随着时局变迁,许多贵族相应变通地以一种庇护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权势,即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将各自亲信安插到上至国会下院议员,下至地方治安法官及教区神职的位置上去,从而构建起一个私党网络体系。如1547—1584年间,“下院增加了119个新的城市议席,……其中绝大部分是依照地方伯爵、高级官僚和有影响的上层大乡绅的意旨而设立的,其占据者绝大多数为其下属或亲戚。”^③虽然国会的重心渐由上院转移到下院,“但是贵族阶级成了像国会中有代表的市镇的赞助人,因而弥补了这一损失。”^④伊丽

① 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第207页。

② J. A. 夏普著:《近代初期的英格兰社会史 1550—1760年》(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伦敦1992年版,第164页,第161页。

③ J. A. 夏普著:《近代初期的英格兰社会史 1550—1760年》,伦敦1992年版,第164页,第161页。

④ C. 罗伯特著:《英国史》第1卷,[台]“国立”编译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406页。

莎白女王虽行严苛的封爵政策，目的在于巧妙驾驭贵族集团为其所用，并非彻底铲除贵族的政治地位。相反，她平素对贵族可谓备加呵护，恩宠有加。而一遇危急之际，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入侵之时，她对贵族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授以军政大权，委其镇守一方。都铎诸王虽曾将沃尔塞、克伦威尔、塞西尔等“布衣”之士擢升为贵胄，但这只是将其视为可助君王治国的罕见辅弼之才，绝没有以其取代贵族阶层之意。而这些青云直上的“新贵们”也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相反他们的政治、人际观念中都显露出一种浓烈的贵族倾向。一代名臣塞西尔在伊丽莎白时代执掌相柄数十年，“宁愿将政府中的官职留与贵族担任，也不愿意惠助那些与他同样出身微贱的人上学受教育，以防他们跻身于政府官员之列。”^①整个都铎一朝，英国贵族放弃了以往那种与君王相抗衡的政治态度，转而与君王积极合作，并牢牢占据着社会政治舞台。

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英国贵族更是稳居权势中枢。即或“内战”爆发，贵族权势也未见有大的衰落。无论是保王党还是国会党都有贵族充担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双方军队高级将领中，贵族占有相当高的比重。王朝复辟之后，贵族势力再度高涨。可以说，直至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角色还多由贵族扮演。

贵族的地位：在传统社会的观念中，贵族的“高贵”品质是由高贵的血统、优秀的品行、优越的生活方式、卓越的社会贡献诸多因素集合而成。与此相应，爵秩这种体现贵族品格的形式亦具

^① 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第127页。

有了某种庄严高贵的色彩。整个社会，无论是封赐者、受封者还是追求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对贵族的内在品格和外在显现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的认同。由此之故，贵族阶层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尊奉的模范。贵族成员的豪华的气派、慷慨而潇洒的风度、优雅的举止、文儒的谈吐皆为中产阶级极力模仿的范式；贵族的府邸是社交的中心、艺术的殿堂；贵族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最为典雅的代表。而实际上，贵族内心之中充满着极度的自私自傲。傲慢与偏见可谓是其精神世界最为明显而顽固的特质本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阶层，凭借庞大的地产家业和手中的强大政治权势，以种种方式、手段控制着甚至导引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

与乡绅阶层的关系：贵族与乡绅同属于地产主阶层，同属于统治者阶层，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利益上的对抗与冲突。乡绅的兴起并不是如传统史学所认为是以贵族的衰落为代价的。在变革大潮中，乡绅、贵族都是获利者。乡绅政治地位的获得和在地方政治上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大贵族的庇护，二者在政治上可谓是无盟军。当然，英国变革时期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正相反，有时社会矛盾还相当的尖锐，甚至到刀兵相见的残酷程度，而且乡绅与贵族也都介入其中。但应看到这些矛盾对立武力抗衡不是以乡绅、贵族为两大阵营展开的。地方的、宗教信仰的、个人的因素在划分敌我界限上起着主要的作用。乡绅与贵族结成联合阵营的原因还来自于他们都处于社会结构上端，是英国社会秩序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实际的经济利益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采取相对一致的立场。赫斯特菲尔德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各